

# 世界 华文 文学研究



第五辑

SHIJIE  
HUAWEN WENXUE  
YANJIU

王晓初 朱文斌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 第五辑

王晓初 朱文斌 主编

SHIJIE  
HUAWEN  
WENXUE  
YANJIU  
DIWUJI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五辑/王晓初、朱文斌主编.—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3

ISBN 978—7—81110—559—9.

I. 世… II. ①王… ②朱… III. 中文—文学研究—世界  
—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4311 号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五辑)**

**王晓初 朱文斌 主编**

---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 电 话	0551—5108468,5107719	开 本	710×1000 1/16
电子 信 箱	roseahbb@yahoo.com.cn	印 张	16.5
网 址	www.ahupress.com.cn	字 数	270 千
责 任 编 辑	刘 云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封 面 设 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1110—559—9

定价:28.00 元

---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 学术视野

- 马华诗歌与浪漫主义 ..... 钟怡雯 ( 1 )  
新移民小说的特质 ..... 倪立秋 ( 27 )

### 比较之窗

- 在两岸文学史中读林斤澜的《台湾姑娘》 ..... 赵冬梅 ( 55 )  
中日现当代微型小说的交流与发展  
——兼谈渡边晴夫教授对中日两国现当代微型小说  
关系之研究 ..... 李玉珍 ( 66 )

### 文本解读

- 论吴玲瑶的幽默风格 ..... 朱文斌 戚柳君 ( 76 )  
文化焦虑与人性守望  
——袁劲梅小说之“道” ..... 王 泉 ( 84 )  
论张翎小说的“残缺”意识 ..... 曹 萍 ( 93 )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少年意象 ..... 王亚丽 ( 102 )

漫游者的权力

——论朱天心小说的历史书写、现代文明批判及死亡主题 … 肖宝凤 (110)

华文女作家笔下的同性恋世界

——以严歌苓、虹影、黎紫书的作品为中心 ……………… 杨晓文 (127)

“葱绿配桃红”:论张爱玲小说的参差对照之美

——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 ……………… 梁 平 (135)

敬畏与抗争的交错融合

——论影片《胭脂扣》主人公如花对命运的态度 ……………… 裴 双 (148)

穿越时空的回响

——《人生自白》中的“明清小说”因素探析 ……………… 尹 诗 (158)

领略使命意识 体认双重边缘

——读《Who is 陈舜臣?》有感 ……………… 曹志伟 (164)

新移民作家“香蕉故事”的突破与困惑

——论施雨、王瑞芸、陈谦等新移民作家小说的文化意义 … 罗四鸽 (174)

理论阐释

台湾网络文学研究初探 ……………… 曾 亮 (180)

试论泰华文学的潮汕文化特征 ……………… 茅林莺 (192)

史海钩沉

马华校园散文的生产语境及其谱系之完成(1979—1994) …… 陈大为 (203)

序跋书评

游于艺者庄伟杰

——庄著《文心与诗学》序 ……………… 黄维樑 (231)

澳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小评

——读《台港澳文学论稿·澳门篇》 ..... 王 健 (237)

华文文学教育的全球视野

——读《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 ..... 江 帆 (241)

创作回顾

我在香港回归前后的诗歌创作 ..... 王一桃 (244)

后记 ..... 朱文斌 (254)

# 马华诗歌与浪漫主义

► 钟怡雯

现实主义一直是马华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信仰之一，不论是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方修所谓的“新现实主义”，这一脉相承的谱系是马华白话文学的主流。战前作品多半靠着《马华新文学大系》得以留存，编者方修是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大系的典律地位成功地把现实主义主流化。在一个文学机制不健全的时代，文学典律化的过程必然产生排挤作用，使得非现实主义的诗歌和文献散佚数据难以估计。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因此成功地建立起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使得上世紀 60 年代以前的马华诗歌主要以现实/写实主义为中心。第二部《新马华文学大系》诗歌卷由周粲主编，选诗年限从 1945 到 1946 年。五六十年代的马华文坛正是爱国主义文艺盛行之际，周粲选入的诗以反映马华文艺独特性为首要考虑，歌颂国家或描写故土所占的比例偏高，正面响应爱国主义文艺的呼唤，亦是现实主义视野下的编选成果。现代主义在 1959 年以诗的姿势降临时，迎上的正是这拨沛然莫能御的巨浪。

现代主义第一次登陆马华文坛，是白垚的现代诗《麻河静立》(1959/3/6)，刊于《学生周报》第一三七期，是现实主义主流下的边缘声音，又称为“马华文坛的文学反叛运动”<sup>①</sup>，其后，《蕉风》杂志、海天、荒原、银星等团体均在刊物上推介现代主义的理论与作品。《蕉风》在 1969 年先后刊载质量兼具的现代主义作品；梁明广与陈瑞献等在编辑《南洋商报》的文艺版《文丛》时，则

<sup>①</sup> 把现代诗视为反叛文学的论述，见白垚《路漫漫其修远兮——现代诗的起步》、《林里分歧的路——反叛文学的抉择》，二文均收入《缕云起于绿草》(吉隆坡：大梦书房，2007)。反叛者，乃反叛现实主义文学霸权。

大量散播西方文学与思潮,是为现代主义大规模登陆的标志,乃有了另一波与现实主义抗衡的力量。《蕉风》编选《星马诗人作品选》(1969),李木香主编《砂拉越现代诗选》,《星马诗人作品选》(1969),温任平主编《大马诗选》(1974)和《天狼星诗选》(1979),张树林主编《大马新锐诗选》(1978),表面上看来,这些选本是对方修大系的“补编”,其实是高举现代主义大纛,以另一种文学史观纠正/对抗现实主义。

温任平在《天狼星诗选》序《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中宣称:“如果说现实主义堆积了一大堆书目而寂寂乎成了某种文学传统,我们有勇气向这传统挑战。”<sup>①</sup>2004年回顾/评价天狼星诗社时,他把天狼星诗社视为马华现代文学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sup>②</sup>。黄锦树认为他的目的是“为马华现代主义正名,确立经典地位”<sup>③</sup>。温任平实践的,果然是他所服膺的现代主义?可不可能产生理论和实践上的落差?他走上的,或许是连他自己都没发现的浪漫主义岔路!

以现代主义来对抗/修正现实主义(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亦是继承——反向的继承),循的是西方文论发展的思考模式。这种“西方”主义式的观点,却不尽然适用于复杂的马华文学。现实主义是一种“以全概偏”的美学标准,乃是作为时代印记的整体印象,焉知现实主义的内部是否涌动着浪漫主义的暗涛?这样的推论理由有二:首先,马华白话文学的源头移植于五四新文学,从新文学的发端到现实主义美学观,皆从中国那里获得启发与继承。打从五四开始,现实主义跟浪漫主义的共存就像孪生血亲,成为推动新文学革命的两股重要思潮,从五四新文学母体获得养分的马华文学,接收

① 温任平:《天狼星诗选·艺术理想与文化操守》,安顺:天狼星诗社,1979,第2页。

② 温任平:《天狼星诗社与马华文学现代运动》,收入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马华文学读本Ⅱ: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4,第589—604页。

③ 黄锦树:《选集、全集、大系及其他》,《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第222页。

现实主义的同时,也一并吸收了浪漫主义<sup>①</sup>,马华现实主义传统之下,其实(理应)包覆着浪漫主义。

其次,马华文学浪漫传统的另一种特色是以本能、感性的情感去回应世界。那种素朴而直观的写作方式是创作的初始状态,如果现代主义在马来西亚是延迟的,浪漫主义则是以“创作本来就存在的素朴方式”(不自觉的)很早便已经存在,从方修和周粲所编的两套大系可以发现不少类似例子。当华人面对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的困境,却又无从使力时,马华创作者的悲观或感伤的书写模式便显色,完成于华社风雨飘摇的198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集《赶在风雨之前》,便是最好的例子。

对现实的无力和感伤,其实是马华浪漫传统的大规模实践,华社问题早已成为创作者的痼疾或隐疾。放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来看,在“忧患意识”式的浪漫精神下以文学回应时代,是马来西亚时空下的特有现象,亦有其时代和文学史意义。虽然浪漫主义最重要而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朱光潜甚至把浪漫主义称之为“个人主义”,也称为“抒情主义”。回溯浪漫

<sup>①</sup>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五四文学运动两股夹缠的思潮。现实主义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为主,浪漫主义则具体表现在个人/个性主义的提倡上。这两股思潮输入中国后,与中国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情境结合,成为推动新文学革命的思潮。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曾说过,五四的文学革命“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五四文学运动深受西方思潮影响,因此19世纪的两大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便成为主导。以文类而论,小说和戏剧更多地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影响,而诗则向浪漫主义倾斜。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诗歌则以表现自我为核心内容。除了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诸人亦深受浪漫主义影响,茅盾、瞿秋白、郭沫若等人把浪漫主义作为破旧与创新的力量。必须强调的是,这两者并非泾渭分明、截然二分。高尔基即把浪漫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之一,可见二者本来就有内在的联系。陈顺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中即把“浪漫主义色彩”列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三大特点之一,引文见陈顺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第53页。有关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转折、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及其转化和散播,可参考的相关论述甚多,以下仅列其中具代表性者:陈顺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周晓明、王又平编《现代中国文学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等。至于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则对两者都下了相当明确而精要的定义。

主义的诞生,原来却跟现实有密切关系<sup>①</sup>。无论是个人的抒情、感伤,或者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浪漫主义在表现方法上突出个人情感,因此总是跟强烈的情感或情绪产生关联,这种特质几乎是创作的基本要素。因此,本文试图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传统之外(或之内),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去观察马华文学,寻找建立第三种传统的可能。本文第一节拟讨论隐身现实主义巨人背后的浪漫暗影,以马华独立后的诗歌创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第二节则讨论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纠葛,重估现代主义在认知和实践上的落差;第三节则拟出一条浪漫主义传统,主要以温瑞安、何柒良和傅承得等作为不同的讨论个案,论述浪漫主义如何落地生根,以及它在马华新诗史上的意义。

## 一、历史的暗影:现实主义遮蔽下的浪漫主义

1919年到19世纪60年代的马华文学思潮,按时间先后,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建立及论争期,反黄运动时期,以及马来西亚建国前后对于爱国主义文学运动的提倡时期。爱国主义文学运动可视为

<sup>①</sup> 朱光潜的浪漫主义定义简述如下:“由于主观性特强,在题材方面,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过客观世界的反映。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特别多,自传式的写法也比较流行……这种自我中心的感伤气息在消极的浪漫主义作品里更为突出,有时堕落到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派多半幻想到未来的理想世界……消极的浪漫主义派则幻想过去的‘黄金时代’。”(详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第343页)浪漫主义的诞生,原来跟现实有密切关系。朱光潜所谓的主观性特强,或者自传式写法,以爱情为主题等特色是浪漫主义后来发展的结果。然而浪漫主义的诞生最初却是跟现实有密切关系。浪漫主义大将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在青年时代曾幻想到美洲原始森林建立平等社会,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曾对法国大革命表示同情。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78—1834),则用他的诗歌号召人们反对奴役和专制,推翻暴君和寡头统治,最后献身希腊独立战争;雪莱(Pers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曾到爱尔兰去宣传改革社会的主张,他的诗作抨击专制暴政。跟拜伦一样,两人均不见容于英国统治阶层,曾先后流亡到瑞士。正如雪莱在《诗与抵抗》中所宣称的那样,诗人是世界上未被承认的执法者,大众的事亦是个人的事,个人不会置身于时代之外,这是浪漫主义者的共同特质(详见 P. M. S. Dawson“Poetry In An Age of Revolution”ed. Stuart Curran *British Roman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p. 49—50)。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延伸及深化，是“在地视野”和“在地书写”加上现实主义具体落实的成果。因此爱国主义文学运动和“默迪卡”(merdeka, 独立)有着密切关系，亦是现实主义思考下的成果，正如马芬在《文艺界联合的思想基础》中的观点：

“爱国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大众的形式”——这是马来亚新文艺的特征。

可以相信：门迪加的现实主义，是不会有人加以驳斥的。因此，文艺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从古典研究中，从古典音乐中，从旧小说中，从浪漫主义幻想中，从闲情逸致中，从灰色情调中，从黄色逆流中……都没有分别地回到现实中来。或者把那些自己尊奉的东西亦带到现实中来烤炼<sup>①</sup>。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前，文化工作者为响应“爱国主义文化”而提出了“爱国主义文学”，爱国主义建立在现实主义的认知上。所谓现实主义，乃是纯粹、无杂质的，是接近“理想主义式的现实主义”。姑且不论这种现实主义信仰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有落实的可能，却足以说明现实主义在那个时代的强势和排他性。马芬的文章发表于1956年，李廷辉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总序中则说：“自从1957年以后，有很多作家就改变了作风，转而追求唯美主义了。在这种思想之下所产生出来的作品，其所强调的是文学技巧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内容方面的问题，这后者是被降贬到次要的地位去。”<sup>②</sup>李廷辉针对的是当时已渐成气候的现代主义，那种个人主义和强调技巧的文学表现方式，被贬为“形式主义”或者“唯美主义”。

他们尽管可以排挤旗帜鲜明的现代主义作品，但跟现实主义形同孪生的浪漫主义，却挟着跟现实主义相似的形貌，成功偷渡。大系其实选入不少“非现实主义”诗歌，杜虹《不，我的心不在这里》(1959)、《我底心掉了》、《我

<sup>①</sup> 马芬：《文艺界联合的思想基础》，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302页。

<sup>②</sup> 李廷辉：《总序》，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2页。

底故乡》<sup>①</sup>便是打着爱国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旗号,实则以浪漫主义手法写成的诗。《不,我的心不在这里》以浅白直接的语言呼喊自由,诗分五节,每节五行,全以否定式句子“我的心不在”为开始,表示心不受限于恶劣的外在环境,到了第五节最末一句才以“自由、和平,我来啦”<sup>②</sup>这一热烈直接的口号结尾,以示心之所在乃是自由与和平。《我底心掉了》亦是假借情诗写故国风物和生活。《我底故乡》则是颂歌式诗歌,浅白简单,全诗四节,“呵!她是我可爱的故乡/是七百万人底母亲”<sup>③</sup>这两句诗,先后出现在第二和第四节,非常符合杜虹在《展开爱国主义文学运动》一文中体现的理念。此文强调爱国主义文学即是加强马来西亚人民的国家观念,以及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激发人民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式则是配合创作内容,以明朗而热烈的战斗形式,以浅白、朴素、大众化的表现方法“反映人生、批判人生、引导人生”<sup>④</sup>。诗里宣誓效忠祖国的浪漫情感热烈而激昂,“纵使你的土地上布满了牢狱和坟场,/我也要守在你底身边”、“活着我要做你底子民,/死了我要化成你地上的灰尘”<sup>⑤</sup>。此诗所使用的意象,例如椰林、胶乳、锡矿、红黏土、白云,或称呼故乡为母亲,诸多典型的“大马意象”<sup>⑥</sup>,却是现实主义的,雅克·巴尊(Jacques Barzun)在《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中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时,特别提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相通处:

浪漫主义的艺术,其实,就通俗的意义来说并不“浪漫”,而且在具体的意义上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细节,并且因此适合对历史和科学

<sup>①</sup> 三首诗仅第一首注明写于1959年,其余二首并未注明写作或发表时间,但排序在《不,我的心不在这里》(1959)以后,应是1959年以后的诗作。大系所收诗歌写作或发表时间规格不一,有的注明有的阙如,有的则不全,仅有年份。同时没有作者简介,大半作者生平不详。本文有的无法注明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的原因即在此。

<sup>②</sup> 杜虹:《不,我的心不在这里》,收入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96页。

<sup>③</sup> 杜虹:《我底故乡》,收入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99—100页。

<sup>④</sup> 杜虹:《展开爱国主义文学运动》,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304—306页。

<sup>⑤</sup> 杜虹:《我底故乡》,收入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100页。

<sup>⑥</sup> 大马,即马来西亚的简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日常用词。

的追根究底的精神<sup>①</sup>。

以上引文说明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注重细节上面是相似的。那么，决定它们不是彼此的差异条件，又是什么？雅克·巴尊进一步指出，是“某种程度的理想化”。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是“朝彻底表现的方向。这让每个对象在最好的条件下尽可能完全地展露自己”<sup>②</sup>，换而言之，浪漫主义具有理想化的特质，而且在表现方法上显现个人情感，因此总是跟强烈的情感或情绪产生关联。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言，浪漫主义更具有“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sup>③</sup>的作用，既是一种艺术方法，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风格。在马来西亚，浪漫主义其实比现实主义更容易成为创作方法或风格，两者的界限是可以更改，甚至是统一的。从这个角度去阅读《我底故乡》这首诗，才能了解何以如此“政治正确”的现实主义诗作，却具有浪漫主义的样貌。那些典型的“大马意象”让我们相信它是现实主义的，可是它的理想化（我爱国家我愿意成为灰尘彻底奉献），在表现方法上的自我沉溺，却是浪漫主义的。周粲在论及杜虹的第三本诗集《抒情诗集》时，认为他擅长歌颂和赞美自由<sup>④</sup>，所谓的“歌颂”和“赞美”，岂非就是浪漫主义的典型手法？

<sup>①</sup> 雅克·巴尊著，侯培译：《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70页。

<sup>②</sup> 雅克·巴尊著，侯培译：《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65页。

<sup>③</sup> 引文见陈顺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第53页。根据陈顺兴的理解，“浪漫主义色彩”实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三大特点之一，在现实主义艺术中，想象的源泉即是浪漫主义，没有想象，没有幻想，艺术根本不成其为艺术。高尔基甚至把浪漫主义看成现实主义最基本的构成，他在《论文学》中提出两者的关系是：“虚幻就是从客观现实的总体抽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从客观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以假想和逻辑推测的东西，以使形象更丰满，则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有益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总的来说，高尔基认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矛盾的，浪漫主义是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如何“真实的”描写现实不仅有艺术方法意义上的作用，还有改造世界的政治效果。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会通及其美学关系，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陈顺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中的论述，有关讨论请参考，第51—57页。

<sup>④</sup> 周粲：《导论》，《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10页。

常夫《我在马来亚的土地奔驰》(1962)同样以胶林、锡矿、白云、红土为意象,歌颂“流着乳与蜜的/富饶的土地”<sup>①</sup>,歌颂农村与城市,三大种族的和谐相处,末了则憧憬美好的未来:“我笑着,唱着/眸子发亮——/为了那更光明/更美丽的远景”<sup>②</sup>,同样是理想化的、自我沉溺的美好想象,其样板化手法跟《我底故乡》如出一辙。严冬的《故乡》亦然,典型的“大马意象”,颂歌式的句子,充满理想的结尾:“我为故乡写下了誓愿/一个理想,一个努力”<sup>③</sup>。老龙的《寄故乡》表现手法亦雷同,大抵不离相像的故土风物,歌颂“平安快乐的土地”,礼赞劳工及苦力的下层百姓,现实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结尾“你日夜都在我心上,/故乡,你好”<sup>④</sup>尤其符合杜虹《展开爱国主义文学运动》提出的激发人民的爱国精神,加强马来西亚人民国家观念的精神。这些以故乡为主题的诗作浅白、朴素、大众化,当然也概念化,亦毫无例外地以炽热强烈的浪漫情感铺展而成。

另一种反映人生痛苦、批判人生的现实主义题材,则围绕着战争和贫困,譬如槐华《你死在熟悉的乡土上》(1961):“你死在熟悉的乡土上/敌人射杀你,用美制的机关枪;/你是死在熟悉的乡土上呀,兄弟! /那枪声还在森林的上空回响。”<sup>⑤</sup>这首诗徒具现实主义的形式,其呼喊与口号掏空了现实主义的实质,并不符合现实主义具备“细节”或者反映社会历史的要求。创作者对现实主义的公式化理解,使得诗作成为情感的机械性表达。换而言之,作者是以情绪在写作,并没有在表现手法或文字技艺上去锤炼,却合乎当代对现实主义的粗糙理解或曲解。从 60 年代的文论可知,“依循着现实主义的

<sup>①</sup> 常夫:《我在马来亚的土地奔驰》,收入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 146 页。

<sup>②</sup> 常夫:《我在马来亚的土地奔驰》,收入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 147 页。

<sup>③</sup> 严冬:《故乡》,收入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 178 页。

<sup>④</sup> 老龙:《寄故乡》,收入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 187 页。

<sup>⑤</sup> 槐华:《你死在熟悉的乡土上》,收入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 316 页。

原则来提高艺术的思想性和艺术性”<sup>①</sup>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大系的编选在这样的要求下,意外收入许多浪漫诗歌,形成编者美学观和入选作品各说各话的情形。

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认为好诗既有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亦必然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上,把诗人视为容器,诗歌的素材便是诗人液体般的情感。他的《抒情歌谣集》的实验性就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sup>②</sup>。华兹华斯的说法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特色。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 1912—?)在其浪漫主义名著《镜与灯》中论断浪漫主义诗歌时,强调两个使内在之物外化的隐喻,其一是“表现”(expression),其词根原有“挤出”之意,也就是内在的东西是在某种外力作用下被挤压而出;其二则是“吐露”(uttering forth),亦有挤压而出之意<sup>③</sup>。这两个隐喻都指向浪漫主义诗歌强烈的情感,因此马华所谓的现实主义诗歌,那些被视为“爱国主义文学”的作品,其实大都循着双轨行进——浪漫主义加上现实主义的书写模式,这些例子在大系中比比皆是。

浪漫最常被使用的一种意义,指的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示出来。萧艾的诗风便属于这一类,他擅长写中下阶层的生活,农夫、伐木者、垦荒的人、贫困的印度人,然而所使用的意象都是正面、向上以及歌颂的,在祖国的怀抱里一切都是美好带着欢笑的。《我们是垦荒者——记一群来自槟岛的垦荒者》(1962)充满理想化的浪漫想象:“我们站在荆棘上/站在园地上/站在祖国的前哨。”<sup>④</sup>雅克·巴尊曾指出,浪漫主义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一种充分的描述<sup>⑤</sup>。在英语中,“浪漫主义”这个词

<sup>①</sup> 宋丹:《我国现阶段艺术工作的几个问题》,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105页。

<sup>②</sup> William Keach “Romanticism and Language” ed. Stuart Curran *British Roman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p. 107—108.

<sup>③</sup> M. H. 艾布拉姆斯著, 郑稚牛等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54—55页。《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英文本出版于1958年,台湾与北京均有中文译本,以下引用译文为北大出版社译本。

<sup>④</sup> 萧艾:《我们是垦荒者——记一群来自槟岛的垦荒者》,收入周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342页。

<sup>⑤</sup> 雅克·巴尊著,侯培译:《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7页。

由两个形容词组成——浪漫的和浪漫主义者。显然马华的浪漫主义偏向前者，一种浪漫的表现方式。诗歌是灯，它投射的形象不是源于世界而是源自诗人，诗人对家国的热爱，乃是因为诗人把强烈的情感投射出去，如灯般照亮了对象，于是这些诗歌看来既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

吴岸《盾上的诗篇》(1962)是另一个适于论证“现实主义遮蔽下的浪漫主义”的案例。《盾上的诗篇》不只是高倡砂拉越“本土认同”的重要诗作<sup>①</sup>，更有符合“提倡和坚持现实主义”、“诗的题材具有鲜明的马来西亚民族与地方特征”、“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对社会与人类的关怀”<sup>②</sup>等四种现实主义写作的特色，特别是《血液》(1957)、《祖国》(1957)、《盾上的诗篇》都是典型的诗例。自从吴岸把砂拉越喻为海上的盾之后，《盾上的诗篇》跟砂拉越便产生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意象不只具有现实感，同时也是国家认同的投射。尤其是诗的结尾：“写吧，诗人，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生命写下最壮丽的诗篇”<sup>③</sup>，乃是对砂拉越土地的认同和礼赞，跟《祖国》中宣誓效忠的民族主义情感，可谓一体之两面。《祖国》表达为祖国献身并埋在乡土的期望。语言直接、浅显，试图为自己和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找到自身的位置，重新诠释建国之后“祖国”的内涵如何产生变化。此外，吴岸编辑的刊物亦命名为《拉让文艺》(1957年创刊)，以砂拉越境内最长的河流拉让江为名，为的是实现文艺反映现实的信仰。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以他的诗集说明了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来没有离开过浪漫主义。无论西马或东马，浪漫主义总是被现实主义的巨大身影遮蔽，或被误认，成为历史的一抹暗影。

## 二、现代主义：实践与理解的误差

现代主义降临马华文坛的方式，带着历史的偶然。根据白垚的说法，马华第一首现代诗《麻河静立》的出现，起因于当时只有15岁的冷燕秋(即麦留芳)对文学因袭问题的质问，冷燕秋的“反叛意识”间接催生了第一首马华现

<sup>①</sup> 吴岸在诗集新版自序中表示：“我反对青年人‘北归’，主张视砂拉越为家乡，并为她而献身。”见《盾上的诗篇》，香港：新月出版社，1962，第iii页。

<sup>②</sup> 龚供：《生命的延续——吴岸及其作品研究》，吉隆坡：新纪元研究中心，2004，第9页。

<sup>③</sup> 吴岸：《盾上的诗篇》，《盾上的诗篇》，香港：新月出版社，1962，第78页。

代主义作品《麻河静立》<sup>①</sup>。白垚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现代诗的起步》中论及《麻河静立》的诞生过程极富戏剧性和偶然性。引文如下：

第二天初夜，我再去麻河，堤边人不见，波心荡，冷月无声。大江流日夜，永恒的宇宙与瞬间的景象，激越回荡，那种人生逆旅，天地悠悠的感触，久久不去，几许低回，写成一首无韵的小诗：《麻河静立》。一九五九年三月在《诗之首》发表，诗写得不好，但诗心突变，引起冷燕秋和周唤的注意，兰言气类三人行，我们就这样写起现代诗来了<sup>②</sup>。

白垚的回顾把现代诗的诞生描述为既是“纯属偶然”，继而蔚为流派，又是“众多个人意识的觉醒”<sup>③</sup>。有趣的是，第一首现代诗的诞生过程却是浪漫的，是一种对不同于当时文学风气的模糊追寻。所谓历史的偶然，便是“诗心求变”加上“众多个人意识的觉醒”，而非一开始便朝“现代主义”走去的成果。

无论如何，现代主义的出现使得马华文坛在现实主义传统之外，出现了第二个与之抗衡的文学思潮。张锦忠认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发生，主要是想求新求变，乃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反动势力<sup>④</sup>。他在《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一文，以及张永修的访问稿《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中概述现代主义在马华的发展史，跟现代主义始作俑者白垚的《缕云起于绿草》的回忆录大抵近似，因此现代主义的出现，论者多半把它视为足以跟现实主义相匹敌的势力。根据张锦忠的观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马华文学其实是双中心的

<sup>①</sup> 马华第一首现代诗的说法各不同，陈应德认为第一首现代诗要推前到威北华（鲁白野）的《石狮子》（1952），温任平则言是白垚的《麻河静立》（1959）。相关论述可见张锦忠《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收入《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温任平《马华第一首现代诗与典律建构》（《星洲日报·星洲广场》，2008—06—08）及白垚《路漫漫其修远兮——现代诗的起步》，《缕云起于绿草》（吉隆坡：大梦书房，2007）等。

<sup>②</sup> 白垚：《路漫漫其修远兮——现代诗的起步》，《缕云起于绿草》，吉隆坡：大梦书房，2007，第86页。

<sup>③</sup> 白垚：《敢违流俗别蹊行——新诗再革命的火苗》，《缕云起于绿草》，吉隆坡：大梦书房，2007，第94页。

<sup>④</sup> 见张永修访问张锦忠记录稿《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收入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第247页。